

# 社会学本土化的演进与本位

周飞舟\*

**摘要:**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演进历程,梳理了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三波本土化争论,指出燕京学派促成了本土化讨论的前提,而此后的本土化讨论在议题方面进行了拓展。但是本土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建立中国社会学的本位,要建立本位,一方面需要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哲学预设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另一方面需要结合中国当代的经验研究,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和文化进行反思。

**关键词:** 中国社会学 本土化 演进与本位

社会学本土化或社会学中国化是一个伴随中国社会学发展而不断掀起讨论热潮的老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问题与一般的社会学议题不同,并非一个经验或实证问题,而是必然与讨论者的立场和意识形态观念相联系,所以这些讨论从高潮到平息,与其说是讨论者找到了答案或形成了共识,还不如说是讨论者更加了解和明确了彼此的立场、观点以及分歧。本土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势紧密相连。在中国从积贫积弱、发愤图强、改革开放到迈向繁荣富强的进程中,本土化讨论的起伏和走向既反映了社会学学科本身的特点,也与社会变动和发展的脉搏与节奏相呼应。近些年来,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热亦是如此,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与中美关系的变幻都构成了我们理解此问题不可或缺的宏观背景。基于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这两个特点,本文的讨论旨在梳理此问题讨论内容的演进,进一步澄清争论问题的立场分歧,并明确提出社会学本土化讨论中一直隐晦不彰的本位问题,以推动中国社会学对于自身发展的反思。

---

\*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feizhou@pku.edu.cn)。

## 一、社会学本土化的前提

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社会学本土化是指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社会的引进、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中国社会,从而发展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关于本土化问题的争论中,学者们的基本共识只集中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是西方舶来品这一基本的客观事实方面。当然,即使对这一点也有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景天魁认为中国存在本土的社会学理论,称之为“中国本土社会学”(景天魁,2017)。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学本土化就不只是一个从外部引进的过程,而是一个内外交流和内外合一的过程。景天魁的这种观点是基于他对“社会学”与众不同的界定。实际上,如果按照他的这种界定,社会学“便等同于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任何人以任何‘学术性’方式形成的一些关于‘社会’的学说。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学’不过是各种‘社会学说’中的一些种类而已”(谢立中,2020)。而且在西方,社会学的起源也不应追溯至孔德,可能应上溯至古希腊时期了。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不对社会学进行如此广义的理解,而是将社会学理解为起源于欧洲工业革命时代,以孔德、斯宾塞以及三大家为代表人物的学科意义上,而非“学说”或“社会思想”意义上的社会学。这种“狭义”的社会学有其成长的特殊“水土”和前提预设,这正是我们讨论本土化时需要关注的核心特征。

对于社会学这样一门舶来的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以欧美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导,还是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主导,是社会学本土化的核心争论问题。那么,什么叫作“主导”?表现在社会学的哪些方面?在社会学的具体研究中又如何体现?因此,看似抽象的本土化争论,实际上和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经验研究和具体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本土化的讨论共经历了三波浪潮,其中所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我们需要仔细加以梳理,才能看清本土化问题的实质。

社会学正式进入中国,可以从上世纪初严复先生翻译的斯宾塞《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出版算起。1914年,美国传教士葛学溥在上海沪江大学最早建立社会学系,开启了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正式历程。此后,随着第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人才回国,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开始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在当时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里,社会学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当时社会调查运动的兴盛。社会调查最早也是由以美国传教士为主体的社会学家

主持的,如燕京大学步济时的北京人力车夫状况调查、清华学校社会科学系教授狄特莫的北京百姓生活调查等等。在陶孟和、严景耀、李景汉等人身体力行的倡导下,北平工人生活水平调查、中国犯罪问题状况调查、河北定县农村调查成为社会调查运动的典型代表。这些社会调查,运用欧美社会学方法,注重统计和问卷调查,以求全面、准确、深入地反映社区和社会群体的风貌与整体状况,也持有强烈的同情底层人民、改造中国社会的人道和实用目的,产生了很多成功运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成果。

本土化问题的出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叫作“社会学中国化”,倡导此讨论与使命的学者以中央大学的孙本文和燕京大学的吴文藻为代表(周晓虹,2019)。与单兵作战的孙本文相比,吴文藻创立了理论方法俱备、优秀人才辈出的燕京学派,代表了第一代社会学家本土化的努力,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梳理和讨论。

燕京学派所提倡的社会学本土化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强调的并非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问题,也没有强调发展中国社会学自己的、不同于欧美的理论和方法,而是恰恰相反,主张真正以欧美社会学的科学精神来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燕京学派对当时所谓“社会调查派”的批评,主要是指他们片面追求教条式的“科学”研究,将社会学理解为“测量”之学,将科学测量理解为“在实地调查之前,脑中应只有一张白纸”(吴文藻,2010:3)。也就是说,燕京学派和社会调查派都主张运用欧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分歧只是在于对理论和方法的理解。燕京学派不满足于只是运用测量和统计手段来“描述”中国社会的状况,而是主张要进入“解释”的层次,所以吴文藻将燕京学派的主要研究手段命名为“社区研究”,以区别于当时盛行的“社会调查”。之所以要强调“研究”,是因为要遵循科学研究寻找因果关系的原则,通过实地调查进行假设检验,就是所谓“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研究终”。由此看来,燕京学派实际上不满足于社会调查派表面上的“西方化”,力图更为彻底地将西方社会科学原则引入中国社会的研究,这甚至成为燕京学派在当时学界颇为独特之处(张静,2017)。

燕京学派的这种主张当然不是自己的创造,而是受到当时欧美学界主流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吴文藻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邀请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派克和英国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来访,除了讲学授课之外,派克还亲自带领费孝通等学生在北京进行实地调

查,这都极大地影响了燕京学派的走向。费孝通回忆当时布朗在燕京大学的演讲内容:

多年以来,人所咸知的社会调查,已倡行于世界各处,中国也已受了这风气的影响。我愿意向诸位贡献一点意见,指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研究之可能性,这种研究我将名之为“社会学调查”。概括的说,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使用的假设”的。(费孝通,2009a,第三卷:5)

这种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显然就是实证科学的逻辑。吴文藻提倡的社区研究,就是以此来修正当时社会调查“搜集见闻”的弊端。那么,这种更进一步的“科学化”“西方化”主张为何会成为燕京学派“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内容呢?

社区研究主要强调的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地域性”,强调调查要有一个固定的地点、范围和边界,就是所谓“社区”。在中国,最合适的社区就是“村落”。有了固定的区域,就可以避免当时一些教育调查、工商调查、人口调查的浮泛特点,能够“沉下去”。二是“整体性”,调查的对象除了地域、人民之外,也包括物质、语言、组织制度和精神(生活态度、宗教价值、精神理想),这构成了一个“整体”。其间的要素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不但在空间的维度上有整体性,而且在时间的维度上也有整体性,因此社区研究不但是“立体的”,还是连续的、活动的,不只是“社区的照像”,还是“社区的活动电影”(吴文藻,2010:465)。三是“解释性”,从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考察出发,社区研究就能够解释社区中某要素或多要素存在、活动的原因和意义。实际上,以上三个方面是层层递进的,地域性是整体性研究、解释性研究的基础,而解释性则是地域性和整体性研究的目的。

与社区研究的主张紧密配合的,是吴文藻提倡的“比较法”或“比较社会学”。吴文藻主张的社会学,实际上就是社区的比较研究,进而上升到制度的比较研究、文化的比较研究。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扎实、深入的社区研究基础上的。

总体来说,社区研究吸收、综合了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虽然也有吴文藻根据其学术理念和中国国情所进行的改造,如

对历史维度的重视、对“社区”概念的新阐释<sup>①</sup>，但是在“西方化”和“科学化”的道路上无疑走得更远。但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个路径上，燕京学派与同时期的中国社会学相比，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程度更加深入，的确产生了具有“社会学中国化”意义的研究成果。

我们以贯彻燕京学派主张最力、成就最为突出的费孝通来说明这个带有悖论性的现象。费孝通先生一生中最为典型和深入的社区研究作品都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的，先后包括《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三部作品。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我所编的《花篮瑶社会组织》，虽则挂了社区研究的名字，而实在还是一种社会调查报告。《江村经济》可说是我个人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而这一本《禄村农田》则至少是我想贯彻社区研究方法的一个企图。至于究竟成功到什么程度，自己不敢说了。”（费孝通，2009a，第三卷：5）

与《江村经济》相比，《禄村农田》是费先生在英国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之后回到云南期间的作品，对于社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把握更加成熟，也弥补了一些费先生自己认为的《江村经济》一书中的缺憾。这段时期是费先生学术研究的高峰期，不但自己亲身深入村庄进行研究，而且领导了“魁阁”的研究团队，团队中大部分都是燕京学派成员或与之颇有渊源的研究者。“魁阁”可以说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风格”的社区研究团队。这些研究者们一面深入农村进行社区研究，一面在马林诺斯基式的“席明纳”（seminar）中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定论文（谢泳，2005：58）。“魁阁”产出了中国社会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批社区研究作品，除了费先生本人之外，还有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等等。这些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超越了当时社会学研究的大部分成果。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费先生才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国士绅》这样的理论性作品问世，并提出了诸如“差序格局”“社会继替”这类深刻描述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本土概念。

“差序格局”的概念作为第一波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成果，直至今今天也未被超越。这个概念可以看作是自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以来，从燕京到“魁阁”的社区研究的结晶。没有人能够否认“差序格局”是个典型的本土化概念，但

---

<sup>①</sup> 对于这个问题，细致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见陆远（2019：81—85）。

通过回顾燕京学派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概念的确是在熟练掌握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后得到的结果。我们由此可以对第一波的社会学本土化进行一个总结,这波本土化浪潮恰恰是进一步推动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而将研究推向深入的。就燕京学派而言,如果没有吴文藻等学者不断地邀请欧美社会学和人类学家来华讲学、有计划有步骤地送优秀学生出国学习、有组织有团队地开展社区研究,就不会产生“差序格局”这样的经典概念。这启发我们,社会学本土化的发展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就是必须充分和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并将其深入应用到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做到这两个“深入”,才能触及本土化的深层问题。以燕京学派为代表的第一波本土化浪潮,实际上是以“西方化”“科学化”的方式为社会学本土化做好了前提准备。

## 二、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

社会学本土化的第二波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港台地区。此间大陆的社会学因 1952 年的院系调整、学科取消而陷入沉寂,研究传统也中断了。港台地区的社会学本土化理念相对集中地反映在杨国枢、文崇一、金耀基等多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论文中,一时间形成了本土化的讨论热潮。虽然学者们的主张和立场也不太一致,但与民国时期相比,港台的本土化研究进行了议题方面的开拓。

港台学者不满足于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有学者称之为“学术洗脑”(杨国枢,2012),同时也发现使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有着很大的局限与错位,不具有所谓“本土契合性”,因此主张对中国本土的理论概念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一波本土化浪潮中,我们看到的主要研究成果就是对中国社会的本土概念如“报”“孝”“耻”“关系”“人情”“面子”等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和研究。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学家在“知识上的自觉和反省”(杨国枢、文崇一,1982),但是这些研究所依靠的理论和方法却仍然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例如用交换理论来分析“孝”“关系”等本土概念,就如同用解剖学分析中国的经络穴位一样,分析的过程变成解构的过程。在用权力、利益交换、博弈或支配解释了“孝”“关系”之后,研究也就结束了,中国本土概念变成了西方理论分析的附属物,没有了存在的“价值”,结果本土化的

努力变成了“本土虚无化”。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港台的本土化浪潮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波反对“学术洗脑”的努力反而变成了彻底的“学术洗脑”,其价值可能仅在于留给我们的警醒而已。

大陆自 80 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重复性地进行了一遍民国时期社会学翻译、学习、应用和再学习、再应用的发展历程。八九十年代国内的主要社会思潮是现代化和全球化,在思想潮流方面也和民国时期流行社会进化论颇为相似,社会学正是处于时代潮流的最前沿。就翻译而言,80 年代初全民阅读的“走向未来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社会学著作占了重要的比例,社会学院系的教学几乎完全以翻译或编译材料为内容。90 年代,随着第一批留学人员的陆续回国,社会学又走在了引领学科“规范化”的前沿,同时也大量引进以美国社会学研究为主的统计调查和研究方法,国内主要大学的社会学院系不断开设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培训班,力图与国际先进的社会学方法和研究“接轨”。到 21 世纪,学科内的“接轨”与大学学校层面的学科建设结合在一起,逐渐以国内和国际的大学排名依据为主要指标,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队伍建设进行不断重塑。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乃至大学教育的学科建设走的却是一条“接轨”名义下的“全盘西化”之路。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第三波浪潮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兴起的。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呼声从恢复重建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周晓虹对此做过一次较为详细的回顾(周晓虹,2019)。但是在社会科学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下,这些零星的讨论有的没能触及实质问题,有的虽然深刻却不合时宜,至少在社会学界反响甚微。真正引起学者们讨论、由大量学者参与的热潮是从 2017 年开始,到 2018 年谢宇发表《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时达到了高潮。对于这一波讨论,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评论,笔者也发表过一篇《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周飞舟,2018)参与其中。因此,对于此波讨论的过程和主要问题,本文不再赘述,下面仅从与前面两波本土化浪潮比较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本次讨论的特点。

这一波本土化讨论有明确的历史定位。很多学者都回顾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并以自己的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概括和总结(王宁,2017;翟学伟,2018)。如谢立中将社会学本土化总结为四个类型:“对象转换型”“补充-修正-创新型”“理论替代型”和“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这四种类型也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最早的本土化就是转换研究对象,将中国的材料和经验作为

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在研究本土对象和问题的过程中,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补充与修正,优秀的本土化研究可以提出一些新概念,如“差序格局”就是如此,这也对应于燕京学派最早的“社会学中国化”努力。“理论替代型”则试图用本土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社会文化与行为,如港台的第二波本土化以及大陆社会学家如翟学伟等人的工作俱是如此。但是由于这种“理论替代型”本土化是用西方社会学的思维或方法来研究本土概念和理论,其背后仍然接受了西方理论的基本预设,很难将本土概念和理论推向新的层次,反而容易将其中蕴含的本土文化意义消解和解构掉。第四种类型“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是谢立中提出的理想化的类型,也指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方向。所谓“全面替代”是指在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上也形成不同于西方的本土体系(谢立中,2017)。谢宇在其关于本土化讨论的论文中则将本土化分成了三类,分别叫作“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可以分别对应于谢立中的第一、第二和第四种类型。在谢宇看来,议题本土化和应用本土化在中国已经完成,而范式本土化则是个“伪问题”。如果社会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则在基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是不分地域的,所以不存在范式上的本土化问题(谢宇,2018)。谢立中和谢宇的观点分歧主要在于所谓的“范式本土化”方面。由此我们可以说,当前发生的第三波本土化讨论与历史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所谓本土化的“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问题。

深入到“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层面进行讨论,显示出大陆社会学家比民国时期和港台讨论更加深入的反思与自觉意识。针对谢宇的“伪问题”论,贺雪峰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问题。所谓“主体性”,是在本土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中国社会和文化作为“主体”来吸收、借鉴西方理论和经验,一切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标准(贺雪峰,2020)。贺雪峰的观点并非社会学的现实状态,可以说中国社会学距离建立自己的主体性还差得很远,但这是中国社会学家一直所具有的一种“自觉”意识的反映。这种“自觉”,较早来源于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提倡的“文化自觉”,后来有郑杭生提倡的“理论自觉”和洪大用提倡的“实践自觉”(郑杭生,2009;洪大用,2021)。无论是哪一种“自觉”,都是对“主体性”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预设进行反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与方法背后有没有西方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以怎样的形式表现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被移植、加工而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得以应用的?这种应用对

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现实、发展关于中国社会的理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传统进行反思：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来自哪里，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中有多少是仍然“活着的传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是“自觉”的开始，也是建立真正具有主体性的社会学的开端。

这一波的本土化讨论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中国社会学落后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表现。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现实的实证科学，社会学即使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明确的预测或指导，也应该能够对社会现实做出深入的理解并以此来促进社会学的发展。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变化和发展早已超出了西方社会诸多发展与转型理论的研究范围，正在开创社会发展的新格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社会学对此有力不从心之感，从90年代以费孝通先生为领军者的城乡发展研究领域研究就可以看出端倪。费先生提倡“文化自觉”，并非对文化的偏好使然，而是他痛感于用原有的西方理论和方法不足以深入社会现实、解释社会发展、捕捉社会心态（周飞舟，2017）。社会学恢复重建已逾40年，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学科和学术体制都齐全而完备，但是学科和学术的目标却是忙于“排名”和“接轨”，不但不能把握时代脉搏，而且在“议题”和“应用”方面也越来越多以西方人关心的问题、使用的方法、信奉的理论为指针。所以，本土化讨论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和紧迫。

### 三、社会学本土化的本体

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虽然可以分为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即社会学是否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与社会学能否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服务，但这两个层面在我们考察的时候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我们很难单独讨论一个层面的问题（周晓虹，2020）。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讨论，可以说是从实践层面发端，上升到学术层面的反思，再不断回到实践层面，在学术和实践的互动中持续推进的过程。

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先驱人物，费孝通先生最先认识到社会学在实践层面的困境并开始反思本土化的问题。我们回顾费先生晚年的研究经历，可以明显地将其分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十年”的阶段。在80年代，费先生感受到高龄和时间的压力，将自己最后的生命阶段定位于“志在富民”，在“行行重行行”中栖栖于城乡发展和边区开放研究。他对小城镇和城

乡关系的分析、对乡镇企业“三大模式”的分类、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讨论都显示了社会学对社会现实深刻的洞察、理解和概括能力,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学以致用”的特点。但在同时,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学调查也给他带来一些对社会学研究的反思。费先生发现,无论是在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还是在西部内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很难用物质条件、制度和政策因素来加以解释。例如苏南的做法很难在苏北生效,甘肃临夏的经商传统只保留在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群内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乡村可能的确要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那么决定这些“适合自己”的模式的因素是什么呢?费先生在晚年的论文中这样写道:

日常生活中这些“意会”的部分,是一种文化中最常规、最平常、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这往往正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已经如此完备、如此深入地融合在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需再互相说明和解释。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琐碎,实际上却是一种活生生的、强大的文化力量,它是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在人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里发生作用,制约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它对社会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强大、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深入有效得多;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根据这些年的实际调查经验,我觉得在地方社会中,越是我们“外人”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越可能是一些深藏不露的隐含的决定力量,越可能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难点,也越值得我们社会学研究者关注。在研究不同的地区发展的差异时,这种被人们“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的东西,往往正是我们揭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秘密的钥匙。(费孝通,2009b,第十七卷:451—452)

这些“外人”看不出、“内人”不言而喻的东西,虽然是揭开秘密的钥匙,但却是社会学研究者“视而不见”的东西。作为社区研究方法的领军者,费先生以强大的社会学想象力洞察到隐藏于中国人与人关系之中的秘密,由此而展开了高于实践层面的学术反思,这就是他在 90 年代不断提倡的“文化自觉”。费先生说,“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作为中国人,就是要能够知道“‘外人’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

其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过去的社会学研究,是把自己当作了“外人”。我们研究自己的社会,就像一个从事社区研究的人研究社区一样,只是从外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虽然我们可以努力达到燕京学派那样的高度,但燕京学派也是“外人”,终究是“隔”了一层。这一层不在于我们掌握的理论和方法有多么科学、多么先进、多么高深,因为这一层是“内外之别”,企图依靠理论和方法来取得突破无异于缘木求鱼。要突破这层“内外之别”,就要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拓展,建立中国社会学的本位意识,而这必须依靠社会学的本土化来完成。

要明确社会学的本位,需要展开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预设进行系统而深刻的反思。这本来是引进任何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时的必要工作,但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百年过程中,大量引进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两个高潮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各约 20 年的时间,这两个时间段分别面临着救亡图存和百业待兴的重大历史使命,很多西方理论被奉为救亡和发展的秘籍、经典而引入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无暇也无力对其进行深度的审视和反思。当前中国的发展进入快速、平稳的阶段,也是反思、概括和总结自身发展道路的阶段,在这个时期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反思工作正当其时。二是要对中国的传统社会思想进行系统而细致的学习,结合当前社会的经验研究,以本位的立场吸收西方理论和方法,推进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产生。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又可以看作是社会学本土化的“破”和“立”的一体两面,或者用叶启政的话来说,叫作本土化的“消极的”和“积极的”的两个层面,即“针对外来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反省和批判”与“社会学知识体系之在地传统的建立”(叶启政,2006:20)。叶启政本人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他所说的“消极的”层面即对外来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的存有预设”进行的反思,达到了迄今为止本土化反思的最高水平,对我们理解本土化问题深具启发性。

在方法论层面,社会学持有一种被叶启政称为“现世世俗观”的预设。所谓“现世”,是指社会学的观察和研究对象只限于此世、当下的社会现实;所谓“世俗”,是指社会学以此世、当下的社会现实中人所秉持的观念为唯一的价值标准,既不讨论超越的、上帝的或至善的价值观念,也避免掺入研究者本人的价值观念,这样来达到一种“客观”“价值中立”地反映“真实”的社会现实的研究境地。社会学研究实际上是把自已当作一面完全反映客观事实的“镜子”,并以此作为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出,叶启政所指出的这种“现世世俗观”预设实际上是极端科学主义倾向在社会研究中的反映。研

究者通过拒绝反思自己的价值立场或“搁置”自己的价值立场而使得自己相信“达到”了客观、科学的标准。实际上,这种对客观、科学标准在社会研究中近乎迷信的态度本身就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叶启政,2006:106)。“现世世俗观”预设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学深具一种“庸俗”的性格,以现实中“均值人”的行动取向和价值观念作为社会现象的研究依据。这使得社会学研究看上去颇具民众的基础,但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化逻辑一样,社会学研究看重的并非民众中最具理想理念、最具行动潜力的那少部分群体,而是现实中实际呈现出来的最为普通、最为大众的那部分群体的特性,而偏离“众数”的小部分,则被看作落后的或者过于超前的、“理想的”而排斥掉了。

社会学的这种“现世世俗观”预设基于其更基本的哲学人类学层面的预设,叶启政称之为“占有满足观”,即“社会最主要的‘功能’性意义即在于提供最有利条件来充实人们的欲望,保证并拓展欲望的满足”(叶启政,2006:108)。这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人和人性的基本假设。人的欲望被作为理解人和社会现象的基础而得到肯定,并进一步肯定基于此基础上的开发和创造,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社会动力的欲望也需要受理性的操控,但是对欲望进行理性操控的最终目标也是如何更好地操控环境以扩张欲望的满足,这也与启蒙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彼此呼应。

基于“占有满足观”之上的社会学理论取向可以概括为“外化结构观”,即人类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不是人性中的复杂要素,而是一套外在的结构。用叶启政的话来说,“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乃必须有赖一个外于个体,且处于个体之上的一个‘人工人’(artificial man)的实体来维持”(叶启政,2006:110)。这个“人工人”,可以是共同体、社会、国家,也可以是一种抽象化的社会结构。基于此预设之上的社会学研究主要的关注对象就是结构如何形成、如何作用、如何形塑人的行动。虽然社会学理论也强调“行动”、自由意志与人的能动性的一面,但是由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内核是“占有满足”,所以最终又“外化”为一套满足此占有欲的社会结构。即使一些社会学家专注于讨论人的自由意志与能动性,也会演变成人对于外在限制和结构的反抗与斗争,这种反抗与斗争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化”或“内化”。因此,无论是人的占有满足欲的“外化”,还是社会结构的“内化”,形式上都是外在结构如何适应人的占有满足欲,实质上都是对外在结构的研究。就如同我们做了“理性人”的假设之后,研究内容就变成了结构和模型的种种变化而再也与人无关一样。

叶启政所指出的上述三个“存有预设”是一种追根溯源式的检视,深入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生成的“水土”层面。“占有满足观”是哲学人类学层面的,“外化结构观”是社会理论层面的,“现世世俗观”则是方法论层面的。这三个预设互相关联、环环相扣,总的来说与西方思想传统的基本风格一致,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大相径庭。

在对西方社会学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视的同时,社会学本土化的另一项使命是要建立中国社会学的本位意识,将社会研究变成“内部人视角”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将本土化过程看成一个求本寻根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刺激—反应”或“冲击—适应”的过程。本土化一般被看作发生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过程,因为受时空局限的影响,所以带有普遍性的理论需要与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和文化相“对接”,所以本土化容易被理解成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问题。如果这样来看,那么强调本土化的特定时空局限总也难以摆脱一个特殊性带来的视野局限的问题。所谓“本土化的本位意识”,就是要明确,对于一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的文明来说,其具有特定时空的物质环境与有着历史绵延性的文化环境已经不能看作这个社会的“背景”因素,而是应该看作这个社会的“本”(潘光旦,2000a:554)。这是看待世界宇宙、人生社会的本位视角,是自己的“眼睛”。失去或者断了“本”,一个人就会变得“不着边际的、没有重心的、‘满天飞的’、找不到据点或支点的”(潘光旦,2000b:141),尽管可以高谈阔论,但是缺乏根本的价值;失去或断了“本”,一个社会和文化就没有活力,也不再具有自己社会和文化的本质特征,如此就谈不上“对接”,也不会存在本土化的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本土化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寻根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其次,本土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过程。外来理论和本位意识的关系是一个“激活”或“唤醒”的关系,没有外来理论,则不会有本土化过程,但是其中主客、轻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不能颠倒。最后,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本土化本身就是社会学的研究过程。这个过程并非钻研历史或“故纸堆”的过程,而是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辨认、辨别“传统”因素的过程,这构成了社会学研究得以深入的主要途径。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因为要辨认、辨别出传统因素,不但需要对传统有着深入的认识,也要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及其预设有着熟练的把握,又能深入到“社会”中去,“透视”其中的混杂成分,把握其变动、跃动的脉搏。

有本位的中国社会学也有迫切的现实需求。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文化自觉”的提出,就是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社会现实中遇到挑战时在学科层

面上提出的应对战略。当前社会学在面对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变迁时,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本土化的使命不完成,社会学的使命便难以完成。实际上,在当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领域,无论是城乡发展、社区治理还是劳工、家庭研究,大都面对严峻的“范式本土化”问题。借助于我们所提出的本土化策略,最后我尝试以农民工研究为例来检视一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及其本土化需求。

农民工是城镇化过程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中国的农民进城务工现象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到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流动务工人口已经超过 3 亿。在世界历史上,人口迁移——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集中——是最常见的现象之一,也是城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的务工人口却难以被称为“迁移”,而是被学术界和政策界叫作“流动人口”。这是因为这个规模巨大的群体具有高度的跨城市、跨地域流动性,大部分不在务工地“落地”和定居。这一方面给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带来了劳动组织和保障、社会治理方面的困难,“流动中的中国”也蕴含着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而且城镇化时代的农村家庭常年处于不完整、不团圆状态;另一方面务工的劳动力将其老幼家庭成员留在农村,使得工业化的劳动力成本大大降低,这样又反过来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相对灵活和有弹性,适应性极强。2012 年以来,中央政府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力图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难以降低。农民工和流动人口问题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最为发达的领域,也充分体现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农民工和流动人口在研究中被看作“劳动力”,他们流动与落地的动力就是高水平工资、劳动和社会保障、住房和生活条件。这充分体现了社会学理论中“占有满足观”预设的影响——研究对象的行动动力和取向被看作是追求欲望满足。以此为基础,社会学展开的大量研究是典型的“外化结构观”的研究,比如农民工是否落地、能否融入,取决于流入城市的户籍制度、保障制度、教育和医疗制度是否公平,取决于流出地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否还能维持,等等。这种“外化结构观”的极端形式表现在:在有些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农民工的家庭以及家庭成员也被看作外在于农民工本人的“结构”,农民工不能在流入地落地是受到了家庭结构的“阻碍”,比如要返乡养老或者给儿子购买婚房,有的研究将其视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交换甚至是“代际剥削”。这种将个体化的欲望满足视为研究对象的行动动力或自由意志的做法是受到西方理论范式影响的典型表现。“占有满足观”的预设首先将研究对象

“个体化”,然后以一种交换、博弈的思路去考察研究对象与其他社会成员以及社会结构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必然性的。

在中国社会中,返乡养老或为儿子购买婚房虽然是指向其他社会成员的行动,但是这些行为既不被行动者看作是与一般社会成员进行的“交换”,更不会被视为其他社会成员对自己的“剥削”。“交换”或“剥削”这种含有强烈价值判断的概念恰恰不是研究对象的价值观念,而是研究者接受了西方某些社会学理论预设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并将其安放在研究对象的头上。这种社会学研究即使方法再先进、数据再客观,也是充满了主观偏见和带有歧视性的研究,这正是社会学本土化需要仔细检视和反思的部分。从理论预设的层面看,在中国社会的传统中,父母、夫妻、子女是“一体”,其间的关系不是以“占有满足观”为动力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周飞舟,2021)。因此,我们在研究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时,应该将家庭成员作为其“内在”的行动因素来加以考察,这样才能理解我们在经验研究中到处可见的农民工坚忍而勤劳的精神动力。从“内部”来进行理解才是客观的研究,也是对研究对象最为尊重的研究。

#### 四、余论:燕京学派的未完成使命

当我们将本土化的讨论推进到思想传统的根源和基本预设层面的时候,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谓“范式本土化”不但不是一个“伪问题”,而且是本土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范式本土化”或者“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的本土化,“议题本土化”和“应用本土化”才是浮泛的、不可能完成的“伪问题”。或者说,如果没有“范式本土化”,“议题本土化”和“应用本土化”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那么我们所看重的议题,所展开的经验研究,背后都笼罩着一些“存有预设”的底色,会不自觉地“从外部”来看待中国社会的现象和问题。

“差序格局”作为燕京学派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的精华概念,也笼罩着西方理论预设的底色。费孝通先生使用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站在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的立场上观察中国社会结构的结果。“差序格局”概念实际上是以“外化结构”的方式对中国人的自私来加以解释,这种解释无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对于“自私”的批评与厌恶态度,只是采取了一种“现世世俗观”的方式,将中国人在家外领域与西方人不同的行为方式展现出来,并参照西方社会的标准将其命

名为“自私”,例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费孝通,2009c,第六卷:124)。同时,这个概念也使用了“占有满足观”的个体化预设,将其放在社会关系的圈层结构中,形式化地推演出了“为了自己牺牲家,为了家牺牲国,为了国牺牲天下”的结论。关于这个结论,已经有学者指出了其中的问题,但大多是从现实角度或历史角度入手的,并没有从本土化的预设层面加以深入的分析(吴飞,2011;周飞舟,2015)。

实际上,如果我们转换立场,站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本位上来看待差序格局,并不一定会得出外化的结构导致自私的结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为仁由己、推己及人是一个绝对的次序,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各人自扫门前雪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而不是自私的表现。扫不扫别人门前的雪不是公与私的差别,实际上取决于自己有没有意愿和能力、别人能不能自己清扫、需不需自己的帮助等许多现实的条件。况且如果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持续了几千年的社会结构特征,在这几千年中,中国社会既有昏暗败坏的乱世,也有清明繁荣的盛世,如何能用这种外化的结构观来解释中国人的国民性呢?

费孝通先生晚年开启的“文化自觉”的思想历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对“差序格局”概念的反思。检视他晚年的文章,有两处提到了他一生中这个最重要的概念:

能想到人家,不光是想自己,这是中国在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主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费孝通,2009d,第十六卷:274)

当你使用这个概念(“心”)的时候,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而从“心”出发的这种“内”“外”之间一层层外推的关系,……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费孝通,2009b,第十七卷:459)

由此可以看到,费先生将“差序格局”看成了中国人“推己及人”的一条必由之路。这已经超越了“外化结构观”“现世世俗观”“占有满足观”等西方预设的思想成果,回到了中国文化的本位。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费先生把早年燕京学派社会学中国化的使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可惜的是,费先生仁

者虽寿,终究没有将社会学本土化的本位基础明确而牢固地建立起来,但道路已经指明,一切有待于后来者的努力。

## 参考文献

- 费孝通,2009a,《禄村农田》,《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9b,《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9c,《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9d,《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贺雪峰,2020,《本土化与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兼与谢宇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第1期。
- 洪大用,2021,《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景天魁,2017,《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陆远,2019,《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潘光旦,2000a,《忘本的教育》,《潘光旦文集》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0b,《说乡土教育》,《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宁,2017,《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吴飞,2011,《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第1期。
- 吴文藻,2010,《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 谢立中,2017,《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类型——以费孝通先生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 ,2020,《“中国本土社会学”辨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2期。
- 谢宇,2018,《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第2期。
- 谢泳,2005,《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潘乃谷、王铭铭编《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国枢,2012,《中国人的心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杨国枢、文崇一主编,1982,《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 叶启政,2006,《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翟学伟,2018,《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探索与争鸣》第9期。
- 张静,2017,《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郑杭生,2009,《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周飞舟,2015,《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第1期。
- ,2017,《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第4期。
- ,2018,《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第1期。
- ,2021,《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第2期。
- 周晓虹,2019,《社会学的中国化:发轫、延续和重启》,《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 ,2020,《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社会学研究》第1期。

#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 *Special Column*

###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Evolution and Self-Post Consciousness**

Zhou Feizhou

**Abstract:**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three waves of localization deba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With Yenching Sc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premise of this issue, subsequent discussions have expanded the main topics of localization. However, the core issue of localization is to establish the self-post consciousness (*benwei*) of Chinese sociology.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systematic and deep reflection on the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 of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study and reflect o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thoughts and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sociology; localization; evolution and self-post consciousness

## *Theme Panel I: Gender and Intimacy*

### **Labor Division, Gendered Practices and Promotion Constraints: A Field Research on Female Police Officers in J City**

Yang Lijing, Liu Ting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female police officers in China arrange and imagine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in a highly masculine vocation and how they